

■聚焦

张学东长篇小说《遥望白银湖》

宁静的诗意图与隐忍的创痛

□王颖

印象中,张学东是一位才气与勤奋兼备的作家。在我刚读完他的那部相对厚重的长篇《人脉》不久,又看到这本颇为清丽雅致的长篇《遥望白银湖》时,这种感觉再度油然而生。可以说,近年来张学东的创作一直呈现出强劲的势头,在短篇、中篇和长篇等各体裁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虽然这是一个长篇写作的时代,充斥着许多仓促上阵为长而长的作品,但张学东对长篇的文体认识却是清醒的,他自言“长篇小说之长,更在于对生命体验的丰厚积累,更在于对时光岁月的幽深洞穿,更在于对文学创作的终极把握”。在他目前已出版的几部题材风格各异的作品中,无论是书写青春的成长记忆的《西北往事》,还是书写“文革”的荒诞历史的《妙音鸟》,书写都市的现实人生的《超低空滑翔》,以及接续古老的传统文化根脉书写后文革时代人的精神和心灵世界的《人脉》,都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思考和“野心”。

乍一看来,相比《人脉》的厚重与驳杂,《遥望白银湖》显得单纯而清新。白银湖曾经是一片纵横相邻一望无垠的大小湖泊,因白茫茫的水色,宛如碎银闪耀的波光而拥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它在特殊的历史年代里被群情激昂、干劲十足的人们填成田地,多年后又因为自然的变化地势下沉水势上涨,渐渐恢复了几分快被遗忘的湖光水景,最后在势不可挡的旅游开发大潮中重新被挖成浩森森的大湖。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白银湖却像是走了一个轮回,然而这其间毕竟已沧海桑田、世事变迁,也因此,作者对它的深情回望与凝视,更像是他用心谱出的一曲忧伤动人的田园挽歌。

小说以“春”、“夏”、“秋”三节讲述了湖畔水家的故事,主要围绕着水家一对漂亮的姐妹花云秀云朵说起。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倾注笔力塑造了这对姐妹花的形象,尤其是云秀,作为一个典型的吃苦耐劳、善良踏实、秀外慧中的乡村女性,可谓光彩照人。因为母亲早逝,哥哥智障,妹妹年幼,云秀早早地就扛起了家里的重担。即便出落到亭亭玉立该出嫁的时候,她也更多考虑了父亲的年迈多病,妹妹的求学花销和哥哥的需要照顾而选择了招女婿。她也曾想过追求自己的幸福,但这念想总是倏一闪光便黯淡了。第一次是因为妹妹的私心和生病,让她错过了和偶然返乡的同学常河的约会;第二次是因为道德和礼法的束缚,她也不忍破坏常河和自己已然建立的两个家庭。生活加诸云秀的,是一次次磨难,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云秀招女婿不成反倒被凌辱,后来不得已嫁给了寻死觅活的她救起来的残疾人麻脸许庆。生下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后,她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伤疤终会愈合,慢慢自己也能够过上平淡正常的生活,然而天真可爱的小渠就在快上学的年纪被大水冲走淹死了。这一噩耗令云秀整个人仿佛被抽干了般,不久父亲也病倒了,生活迫使她再次坚强起来。在将父亲转到县城、省城的大医院

不断救治和她的全心照料下,总算把父亲从鬼门关抢了回来,然而尽管她强烈反对,不愿再给她和父亲增添负担的妹妹做出了悄然出走离家打工的决定,从此下落不明。为了找到云朵,云秀也只好去了县里的一家餐馆打工,勤快能干的她先是得到了老板的信任,却又因误会会被诬赖绑架打劫而关进派出所。后来被人贩子拐卖到山沟的云朵在常河的帮助下回到家,父亲的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许庆却因为长久的压抑而沉迷上赌博,将家里的钱抢走并把云秀打得头破血流,最终带着悔意在风雪夜冻死。小说对云秀的遭遇有一句感慨:“再好的女人都抗不过自己的命。命里该有什么就是什么,命里给你怎样的结局,到头来就是这样一个结局,命这东西来邪气,它总是对那些过于顽强或完美的东西,给一些致命的打击,好像这样来世上的所有事情就都扯平了”。这大抵也反映了乡土文化和伦理对女性的观点。然而云秀在展现乡村传统女性“安贫”、“克己”、“认命”的同时,更多表现了女性在忍辱负重中的自强不息和坚忍不拔。在一次次命运受难的淬炼中,云秀这个从苦难中艰辛跋涉而出的女人,渐渐散发出圣母般皎洁的光辉。

在同龄的写作者中,张学东是一位有自觉的苦难意识的作家。因为自然条件等限制,西北乡村似乎天然地与贫困、闭塞、苦难联系在一起。张学东的苦难意识,不仅体现在持之以恒的观察和描述,还体现在他的反思和探索上。在作者以往的许多小说中,他写苦难、创痛,是凌厉而尖锐的,不惮将残酷罪恶展现到极致。例如《妙音鸟》中羊角村所发生的事情,小说通过夸张和变形的叙述,让人得到一种震惊体验,以重现那个特殊时代的荒诞与复杂性。而这次作者在处理苦难时,却是含蓄、隐忍、节制的,并增添了许多温柔与暖意。我想,这也暗含着作者对苦难的理解。如果说《妙音鸟》是放,《遥望白银湖》则是收,例如小说对云秀被凌辱的遭遇与云朵被迷昏拐卖的遭遇,并没有大肆铺张而只点到为止。作者用平实、素朴的语调叙述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春种秋收、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在这里,苦难成了日常人生的一部分,因此便不显得那么突出。作者的笔触也没有一个劲儿地沉浸在对苦难的渲染中,而是常常涤荡开去,告诉我们“一只布谷鸟在前面的芦苇荡中咕咕咕地叫起来,声音断断续续地在水面上滑行,悠长而且空灵”,“秋风簌簌地吹黄了树梢上的树叶,天气微凉,湖里就开始飘荡那种甜丝丝的香味,有时气息浓得像刚刚烧开的一壶酽茶”。在“接天连日”的湖光水色中,在作者诗情画意的笔触中,好像苦也被稀释了,变得风轻云淡。这里的人们对苦难也有着充满诗意的转化能力,正如小说在一开篇描述的,这里的人管庄稼叫“湖”,把“下地”说成是“去湖里”,好像不是去劳动受苦,反倒是观光玩水一般。

的惬意。小说中还有许多段落可以当做优美的散文、风景画来欣赏。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的写法对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心理都起到很好的铺垫和暗示。

例如云秀怀了常河的孩子后,为了不破坏自己和别人的家庭,毅然独自决定打掉胎儿。那晚与常河的会面,云秀的内心是极不平静的,然而小说并未直接描写云秀,而是着重描写了夜晚的景色:“这晚的月光太明了,水面上镀了一层油亮水滑的幽光,像漂浮在大海碗里的一层辣椒油。月牙儿也仿佛艳美地溜进湖水里沐浴着,漂洗得越发晶莹透亮一尘不染。”宁静的诗意图愈发衬得云秀创痛之隐忍和生活之沉重。

小说的主线是水家姐妹的成长与生活,但作者并不仅止于讲述一个家庭,更辐射到进城打工、农村旅游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乡土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令人关心的话题,亦再度让人看到他的抱负。从最初的短篇创作开始,张学东就一直关注着西北厚土上农民的生存和精神状态,这一情怀始终未变。在乡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过程中,乡村的发展和变化是不可阻挡的,而伴随着固有的恬静安宁被打破的,是田地的逐渐荒芜和村里年轻人飞出去的意愿,云秀含辛茹苦供云朵上学也是为了妹妹不用重复自己的老路,而能有更好的前途和出路。城市对他们而言,就像是云秀眼中对前来测绘的“太阳帽”的感受,“和村里人全然不同的气息,陌生、干净、庄重,不像庄稼人那样浑浊和施肥带水,而充满了街道楼房和柏油路才有的那种坚硬与沉着,甚至有点像妹妹过去每天从学校带回家的那种书本味儿,总之完全来自她所未知的那个领域”。一方面是对城市的美好想象,一方面人物的进城故事又是悲剧性的,无论是云朵刚到旅馆落脚就被下迷药囚禁,还是云秀被老板冤枉关进警察局,都反映了城市的危机四伏,以及人与人之间信任的脆弱。小说又通过云秀爹的落寞,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不可避免的创痛。这个老笨手干了一辈子农活的庄稼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热爱并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一块块消失,生活也因此失去了存在感和意义。即便是原先随大流而走的云秀也渐渐感到了土地被机器挖掘殆尽后人心的骚动与不安,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风平浪静与和睦。作者通过这些面向的交织,显示了乡村改革发展的复杂性。

因为出身在乡村,作者的语言和他笔下描述的生活十分熨帖,整部小说读起来简单明快,一气呵成。然而或许也因为这种熟极而流,有些描写稍显随意,有的地方只是从表面划过。小说如能写得更丰富和深入些,以完整的四时轮回分节,其故事和人物也许会更生动。总的来说,《遥望白银湖》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流水般的画卷,人间冷暖、人生悲喜,都凝聚在这画卷里。在挽歌般的一唱三叹中,白银湖也因此成了一个美丽的乡村寓言。

■短评

汪洋恣肆的言语风暴

——谢望新的散文创作片谈 □曾海津

散文的魅力在于,它是一种超越功利的文本,它的书写方式是最朴素的,也是最艰难的,因为它是从真诚抵达真诚,从心灵走向心灵的,因而最忌心灵的造假,诚恳庄重、有感而发始终应是散文话语的主流。谢望新的散文显然是在坚守这种写作准则,在描绘亲情这片情感的汪洋时,他认真捕捉那些巨浪波涛和细微涟漪。谢望新的散文看似朴实无华,可是构思精巧,遣词造句也相当凝练精准,有一种经过岁月历练后的传神和美感。在这些朴素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他不露声色地寄寓内心深情,大巧若拙,充满诗意和哲理。

汪洋恣肆,动辄数万言,这是谢望新散文的显要特点。谢望新曾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说过:“作家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了解的深刻程度和对社会现实思考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作家的作品审美品位和审美价值。”而深度和广度,反映到散文中,就是一个“气象”问题。谢望新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也有敏锐的观察视角,所以他的散文自有一种“大气”贯穿其中。比如在《珍藏起一个名字:母亲》这篇文章中,作者并没有单纯讲述母亲的故事,也没有一味的倾泻自己对母亲复杂的情绪,而是上升到更高的境界,直达生命真谛的哲理,用“偶然与必然的规律”来评价母亲的故事。最后他说:“我认定,亲人之间,特别是至亲之间,一定有灵魂的感应。”因而导出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却能与母亲在电话里对话。作者无意珍藏母亲,却有意将母爱张扬。这篇长达万言的散文把母亲的灵魂赤裸裸地公诸于世,让自己怀念的同时,也让读者知道“我”的悲惨身世与母亲的悲苦,记住“我”有一个这样不幸而又充满人间真挚的母亲,引发人们对于生命对于亲情更多的思考。这就使得散文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情怀,更能体现力度和深度。

文本创新实验是谢望新散文创作的一个着力点。谢望新的散文跨文本写作特征明显,比如纯粹写真人真事的散文《你带走一片阴云》就曾经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事实上,谢望新并非专事散文创作的作家,他先是以文学评论、报告文学闻名,并涉足影视创作,值得一提的是近年还创作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部手机短信体小说”。他学者的身份和多种文体历练决定了他的散文具有开拓性和先锋意义。他在散文中,善于采

■创作谈

卡尔维诺如是论述:但愿有一部作品能在作者以外产生,让作者能够超出自我的局限,不是为了进入其他人的自我,而是为了让不会讲话的东西讲话,例如栖在屋檐下的鸟儿,春天的树木或秋天的树木、石头、水泥或塑料……卡尔维诺揭穿了小说的谜底,他让小说突然变得既神秘又真实起来,我们也仿佛听到来自那遥远的村庄的一切声响,草叶、树枝、秋桔堆、茅草屋、阴暗的菜窖、一口枯井、一辆废弃在路旁的马车,以及森森的几根马的白骨,在漆黑的夜晚全部恢复了生机,闪闪发光,说出各自的语言,激活了整个世界。这就是我们进入一个故事前的神圣召唤,而长篇小说的创作更加需要这样的生机与召唤,它可以让作家摆脱现实束缚、消除一切杂念,写作本身具有了使命感。

我的首部长篇小说《西北往事》创作之旅始于2001年,时隔数年那些洋溢着青春气息的伙伴们的面孔我依旧清晰可辨,故事里的每个懵懂少年都曾与我朝夕相伴悲喜相随。因为是第一部,我格外珍视,初稿完成后,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打开文件修改一次,或者,只是认真逐字逐句地读上一遍。那时陪伴我的除了电脑里文件,更多的是那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我相信它才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有时候想一想,假如离开那孤寂,也许就不会产生小说,即便写出来也是支离破碎毫无生气的。后来我实在是记不清了,从初稿到2006年在杂志上发表乃至出版,前前后后修改过多少次。这倒是让我从一开始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长篇小说不可能一蹴而就,不经历风雨,何以见彩虹。

比之《西北往事》、《妙音鸟》的创作可谓漫长而艰辛。早在新千年之初,在宁夏的西夏陵区首次发现了妙音鸟,那是一种具有中西亚风格特征的“人面鸟身”的青石雕塑,相传妙音鸟自幼在壳里就能发声鸣唱,声音极为婉转动听,世人将佛音与这种美妙绝伦的叫声相提并论。我一直被这与众不同的神秘发现所深深吸引,并开始收集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后来,我独自到南部的一个小山村蹲点考察。我发现,即使在那偏远的贫困村庄,仍然遗留“文革”时期荒唐而又疯狂的痕迹。呆在深山中的寂寞日子里,我曾无数次被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鸟的歌声所召唤,那些美妙而又忧伤的鸟鸣,总叫人有莫名的感动,从而勾起心中无限的遐思。2003年起,我正式动笔创作长篇《妙音鸟》,小说按照既定的思路,一口气写了七八万字,正在我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时候,问题也随之出现了。我忽然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或者说这样写下去毫无指望:小说写得太扎实了,又过于紧贴那段历史,故事缺乏寓言式的灵动和宏大叙述的超脱,尤其在小说的时间处理上,显得过于笨拙和简单化了。如果继续写下去的话,这部小说也就彻底毁了。

那一阵子,我简直苦恼得要命,浑浑噩噩,找不到出口,创作只好停下来,继续修改早先完成的《西北往事》。在山穷水尽般的困扰中,2003年已然过半。10月我有幸见到陈思和先生,他谈起我的《送一个人上路》,认为小说以一个孩子的眼光,打量了非常复杂和残酷的历史问题,并用夸张简洁的笔墨表达了出来,从而使作品有了寓言式的意味。这番话对我确实触动极大,似乎让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对待复杂历史事件的最简单的方法,同时,也激活了我重新构思小说的一个个神奇的细胞。一时间新的思路便应运而生,比如,我想用一年的文本时间来涵括十年的乡村历史,我想让孩童和成人的视角在叙述中交错,我想以狼患开篇,最终又以地震结束,从而暗示在那些特殊的年月,乡村的苦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恰恰这时,我去乡下参加一位老人的葬礼,我忽然联想到过去村庄的黑夜总有神鬼鬼的故事发生,于是我决定在小说里也让那些死魂灵一次次粉墨登场,完成他们在阳世未尽的心愿,而活人又可以跟死人聊天或畅所欲言,那些冤魂经常在村子里四处游荡,他们的出现给活人的世界和身心带来一次次震动和警醒。

有了上述两部长篇作为铺垫,接下来的创作便得心应手多了。2005年创作的《超低空滑翔》故事来自于我在民航院校及地方民航局学习工作的近14年的经历,或多或少带一些自传性质。2009年创作了《人脉》,接下来近两年半时光,我回到了传统,尤其是对中华传统儒家文化的涉猎,当然这都是作品的需要。

托马斯·曼的一句话教我永生难忘:好东西需要慢慢地来说,而且好东西往往又会叫人厌烦。经历了多部长篇小说创作之后,使我愈加坚信:“70后”作家的创作道路还很漫长,我们需要时刻警醒,更需要锲而不舍。尤其是对于长篇小说,那是心灵意义上的长途跋涉,是对作者体能和心智的双重挑战。试想,文学史那些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有哪一部是作者茶余饭后溜溜达达时不痛不痒地消遣出来的?长篇小说之“长”,在于对生命体验的丰厚积累,在于对时光岁月的幽深洞穿,更在于对文学创作的终极把握。我这样说其实想强调,“70后”作家要想在今后十年、2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有所作为,就应该规规矩矩地回到最基本的创作规律上来。当下已不再缺少小说家了,缺乏的是真正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不要总是试图为所谓的大时代去做什么,“70后”要做的就是写出真实的自己来。

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这种依赖是长期的习惯性使然。通过“我”小时候和祖母一起睡觉时的细节刻画,让读者深刻地体会到了祖母对“我”的爱以及“我”对祖母深深的依恋,细腻地表现了“我”内心的情感,让文章更具感人的力量。

精巧的构思也是谢望新散文显要的优点。散文胜在有情,但是也不能忽略行文中的结构安排,只有好的构思,才能吸引读者,也更能凸显作者的性情。谢望新的散文结构精巧,读来不由地令人拍案惊奇。比如在《珍藏起一个名字:母亲》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平铺直叙,而是采取了小说的笔法,将多种叙事方式融为一体。作者在第一节课就介绍:“14岁相认母亲和姐姐,两年后,姐再相约我到母亲居住的城市相见。”这段话使人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头,简直妙不可言。“14岁相认母亲和姐姐”、“两年后”,简简单单几个字,关于家族历史的悬念就全出来了,而且时间跨度灵活,让读者仿佛坐上时光的过山车,在时空里飞速穿梭,目不暇接地体验着那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如散文的第4节,写一个高挑个子的年轻女性进门后,“厅堂后间屋,不时传来两个女人的说话声,一个清脆,肯定是刚才进门直入的那个女子,另一个声音低微得多,还带着喘气声。我奇怪,这里到底住了多少人?再侧耳谛听,更清晰传来年轻女子的喂饭声。细声细气的呵护声。不久,年轻女子又风一样离去。依然不与任何人表示,仿佛这些人不存在。”

“说话声”、“喘气声”、“喂饭声”、“细声细气的呵护声”等这些如雾如花般的朦胧的意象吸引着读者神经,在此我们只闻到其声,那个神秘女人的身份,直到第12节才撩开面纱。此外,母亲第一次婚姻“丈夫失踪”的谜团,也是直到第23节才含蓄地揭开,这种伏笔与悬念的呼应、虚实相生手法的娴熟运用,使得故事峰回路转,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余音绕梁不绝如缕,令人异常“过瘾”。

在当代汹涌繁杂的散文书写大潮中,谢望新用一颗诚挚的心,书写珍藏在生命里的那些难忘的记忆。读谢望新的散文,可以感受到那份血脉亲情的浓郁与温厚,也可以领悟到一个真实的社会的人对人生百态的思考。评论家雷达称他的散文为“带血丝的回忆”,“直面灵魂的勇气”。白烨则认为,他的散文“表现出了看重亲情乃至超越亲情的人间大爱”。总之,谢望新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崭新的大散文世界,无论在书写对象上还是在书写方式上,都有明显的个性化特点,既还原了真实,又彰显了人文情怀,为当代散文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审美空间。亲情因了他,有了大爱的悲悯;记忆因了他,焕发了生命的诗意。

我的长篇小说之旅

□张学东

一代人的青春自画像
——评晋阳长篇小说《中国式二代》

□王春林

对于一个初涉小说创作的青年作家来说,肯定会有学习、有所师承的。我们注意到,在小说后记中,晋阳曾经专门提及美国作家塞林格及其经典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小说叙事过程中,叙事者“我”也曾经特别强调,自己喜欢同为美国作家的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很显然,在文学谱系学的意义上,晋阳自己的青春期书写,曾经受到过以上两位异域作家的影响。阅读《中国式二代》,其中所散发出的以上两部小说的气息是非常鲜明的。此外,尽管晋阳自己没有提及,但如果着眼于中国本土作家的话,那么,王朔对于晋阳的影响,我觉得也是不容忽视的。

具而言之,《中国式二代》在两个方面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其一是小说表现力很强的、携带并散发着浓郁时代气息的叙事语言。“时间在腐烂中慢慢流逝,我觉得自己的未来却越来越难以把握。”“理想在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光环,犹如皇帝的新衣,总会被揭露掉,露出背后的现实。”“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原创’,可悲的是很多人渐渐地都成了‘盗版’。”“外边天气的热度真和超女选秀的舞台似的,可惜没有粉丝尖叫。”时间可以“腐烂”,理想是“皇帝的新衣”,天气的热度居然堪比“超女选秀的舞台”,人可以是“原创”,也可以是“盗版”,这些语言的新鲜与陌生度,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真难为晋阳能够写得出来。不仅如此,小说中那些不断夹杂着英语单词的叙事语句的频繁出现,也都让读者过目难忘。所有这些,都极其有力地凸显出一代青年的基本生存状态。很难想象,假若舍弃了这样一种多少显得有些越轨但却充满青春激情的原生态叙述语言,晋阳是否能够把当下时代青年大学生的生活如此活灵活现地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一个作家能否运用富有艺术表现力的及物语言准确到位地描摹再现自己的表现对象,乃是衡量评价其小说创作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在小说创作上初出茅庐的晋阳,在叙事语言的运用上能够抵达这样一种相对成熟的地步,充分证明其具备良好的写作潜力。